

畫龍之後，點睛之時：五年規劃與施政報告的協同效應

董光羽

維港觀瀾

行政長官李家超8月26日「落區」到深水埗訪長者後宣布，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與2026年施政報告將於9月16日同日公布。李家超以「畫龍點睛」妙喻二者關係：五年規劃是「將龍的眼睛點出來」，而施政報告則是「將這條龍畫出來」；換言之，五年規劃指引方向，施政報告配合執行，兩者有機結合、並駕齊驅。筆者認為，特區政府這一安排絕非簡單的「巧合」或「方便」，背後其實是香港管治思維的一次深刻變革，其意義值得深入剖析。

香港對接國家戰略責無旁貸

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將「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單獨成章，並對支持港澳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並首

次加入支持香港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和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的部署，以及將「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

在「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下，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有責任更好回應和落實國家提出和支持的各種發展機遇，而制定自身的五年規劃，正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最直接、最準確的體現。筆者認為，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正是要將「香港所長」精準對接「國家所需」，作出務實可行、高瞻遠矚的戰略部署；這既是香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要舉措，更體現香港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責任與擔當。

規劃與報告一脈相承

根據李家超的說法，五年規劃是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藍圖，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導文件；施政報告則是行政長官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

和因應實際情況的年度施政重點，兩者息息相關。換句話說，五年規劃是指明「香港去哪裏」的戰略規劃，施政報告則是解答「香港怎麼走」的具體方案。

過去一直有意見認為，香港施政較為偏重應對短期問題，相對缺乏宏觀與長遠的戰略布局，其中在房屋供應、產業轉型、北都建設等方面，更予人戰略延續性不足的觀感。香港五年規劃的制定，正是要在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同時，為香港擘劃清晰的中長期路線圖；而為免藍圖因缺乏具體落實方案而淪為空中樓閣，首份五年規劃就需要港人熟悉的年度施政報告加以配合，才能確保各項戰略目標落地見效。

尤其今次是香港首度制定自身的五年規劃，倘將兩份文件分開在不同時間發表，或會令市民誤將戰略規劃與政府施政割裂開來，甚至引起「規劃歸規劃，施政歸施政」的誤解；如今特區政府決

定同日公布，將可形成「規劃引領施政、施政落實規劃」的理想狀態。

同日公布助公眾看清全貌

再者，對部分市民而言，五年規劃中各項戰略部署和願景，或許還是較為遙遠。李家超在落區諮詢期間也觀察到，雖然廣大市民一致支持制定首份五年規劃，但對五年規劃的理解始終不深入。故此，若將兩份文件分開公布，市民難以直觀理解兩者如何銜接運作。

今次同時公布施政報告，除了讓市民可以更清晰理解特區政府的施政理念和未來路向，更可令大家知道政府當下有什麼措施，可在朝向五年規劃目標的相對短期內，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社會都預期，李家超會在施政報告中訂立多項指標作為年度里程碑，之後特區政府亦將會因應國際環境、經濟預期和最新動態，制定該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點和重大

項目。這種「五年規劃定藍圖、施政落地促振興」的機制，兼具戰略定力與靈活彈性，確保施政既有長遠方向，也有即時回應。

9月16日，當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宏觀藍圖與施政報告的年度施工圖同步呈現於公眾面前，香港將迎來一個「遠近結合、軟硬兼備」的施政新格局，標誌着香港正式告別過去較為側重短期應急、過度依賴市場和被動回應的傳統模式，轉而展現出前瞻全局、主動作為與因勢利導的治理新風。

五年規劃是香港主動對接國家戰略的時代答卷，施政報告則是將「藍圖」轉化為「成果」的清單，這種「藍圖與施工圖同繪」的安排，值得社會各界充分支持。期待在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引領下，特區政府繼續積極有為、勇於擔當，加上全港市民齊心協力，定能將「藍圖」早日變為「美好現實」，推動香港在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再創新輝煌。

時事評論員

超越「信貸幻覺」：GDP增長與實體轉型陣痛的結構解碼

王曦煜

議論風生

近期，隨着本港部分大型連鎖餐飲集團與零售品牌在2026年首季加速重組門市，加上核心商圈老字號相繼告別，街頭舖位空置（俗稱「吉舖」）與業態大洗牌的現象再次引發社會熱議。與此同時，官方公布的本地GDP數據卻維持增長，這種「數據與體感顯著脫節」，在網絡上催生了一種將問題簡單化、甚至陰謀論化的觀點。有論者聲稱，「吉舖處處但GDP上升」背後另有隱情，將中小企借貸難歸咎於美港息差，認為銀行為了防止借款人將港元資金轉換為美元套利外流，因而利用加強合規審查與收緊信貸，主動「抽乾實體經濟銀根」。這類論述看似邏輯自治，實則混淆了聯繫匯率的制度本質，也誤讀了商業銀行的風控邏輯與香港經濟當前所面臨的結構性轉型現實。

市場結構與消費模式重塑

該觀點最大的盲點，在於將聯繫匯率制度的「自動調節機制」誤解為人為限制。當美港息差擴大誘發套利交易（Carry Trade）、港元觸及7.85弱方兌換保證時，金管局按既定規則「賣美元、買港元」，這是貨幣發行局制度（Currency Board）的自動避震運作。這一過程會自然縮減銀行體系總結餘，進而推高港元拆息（HIBOR），最終自動抹平美港息差並收窄套利空間。這是市場利率與資金流向的自我平衡機制，根本毋須銀行透過「人為拒貸」或利用合規審查來阻擋資金。把貨幣制度的自動平衡，解讀為銀行體系配合「金融戰」而人為抽乾實體流動性，無異於顛倒因果。

再者，將銀行加強合規風控與反洗錢審查，歸咎為「防範資金外流」的屏障，更是

對國際金融監管常識的誤解。合規的核心目標是打擊非法洗錢與黑錢流動，而非限制合規的資本配置。在資本自由進出的香港，只要資金來源合法，進行跨幣種轉換完全合規，銀行無權亦無必要以此阻撓正常借貸。

本地中小企與餐飲業感受到的「借錢難」，本質上是商業銀行在信用周期下半場的理性風控。金管局公布的香港銀行業總體不良貸款率（Non-performing Loan Ratio）從過去長期的低位（約0.5%至0.8%），一路攀升至超過1.8%。2024年底，整體不良貸款率升至約1.96%，2025年至2026年初，壞賬率在1.86%至1.98%的區間高位震盪，部分集中於中小企與特定商業地產貸款的壞賬率更高，這直接印證了銀行正面臨實體資產與商業貸款壞賬風險上升的現實。

當前本地零售與餐飲業營運壓力加劇、抵押品價值承壓，商業銀行基於審慎原則下調授信額度、提高風險溢價，是維護金融體系穩健的正常決策。要求銀行在實體壞賬風險上升時逆市場規律盲目放貸，不僅不切實際，更是在為金融體系積聚系統性風險。

至於街頭出現的空置街舖增加，與本地GDP增長並存的矛盾，本質上並非金融體系的失靈，而是香港正經歷一場深層次、階段性經濟轉型的結構性陣痛。

一方面，GDP的增長主要由金融服務、專業服務及外貿等高附加值產業驅動，展現了宏觀經濟的韌性；另一方面，當前實體零售與餐飲的陣痛，主因並非「借不到錢」，而是本地消費模式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居民北上消費常態化、跨境電商普及，訪港旅客轉向深度體驗而非傳統的高消費購物模式，這些是深層的商業模式變革，更非短期的景氣波動，而是市場結構與消費

模式的永久性重塑。將這種深層的結構性轉型，過度簡化為「銀行不放貸」或「資金流出」，不僅無視市場演進的自然規律，也遮蔽了實體經濟迫切需要轉型升級的真正議題。

在新格局中找到立足點

香港經濟正處於高息環境與消費結構轉型的雙重挑戰中，面對這場深遠的結構性考驗，社會最需要的，是基於客觀規律的商業創新與產業升級，而非沉溺於情緒化的簡化歸因。將聯繫匯率下的市場自動調節與商業銀行的常規風控，曲解為「金融戰」或限制實體經濟的幕後黑手，不僅無法為陷入困境的中小企提供實質解方，反而會掩蓋消費模式轉變的真相，甚至誤導公眾對金融體系穩健性的理性認識。金融體系的審慎是抵禦系統性風險的基石，實體經濟的陣痛則是市場出清與資源重組的必經過程。唯有剝離陰謀論的迷霧，回歸市場理性與經濟本質，公眾與業界才能看清這場經濟轉型的真實全貌。

回顧歷史，不難看到香港每一次經濟躍升都伴隨着舊模式的瓦解與重建：1950年代轉口港貿易受阻，香港憑藉靈活彈性迅速轉向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成就「香港製造」的輝煌；1980年代面對製造業北移，香港成功跳脫工廠經濟，轉型為高附加值的國際金融、航運與商業服務中心；2000年代初經歷亞洲金融風暴與SARS衝擊後，香港亦透過零售與旅遊業的升級與開放重塑景景。歷史證明，香港的韌性從來不自固守舊有的商業模式，而來自面對結構衝擊時的戰略韌性與重塑能力。面對當下的「結業潮」與體感落差，唯有正視消費結構的不可逆變革、推動商業範式的迭代，方能在新的經濟格局中重新找到實體經濟的立足點。

香港大公文匯智库副總監

楊莉珊

有話要說

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宣布將於9月16日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李家超形容有關安排是經過思考且有「畫龍點睛」的作用。在香港步入由治及興新階段，又逢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如何對接國家戰略實現香港更好發展，成為特區政府最大的挑戰，同時也是最大的機遇。兩份重要文件同日公布，看似一項日程上的調整，但卻可從中看到至少三點意義。

一是打通短期施政與中長期發展的邏輯閉環，實施政布局的綱舉目張、精準落地。長期以來，香港施政以「年度」為規劃單位，民生改善、經濟提振、社會治理等具體工作的成效衡量，側重於「年度成效」。這雖然有較強的時效性、針對性與靈活性，但也缺乏中長期的系統性布局、戰略性謀劃。

明確目標任務方向指標

五年規劃是香港史上首份系統性編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綱領，立足香港實際、貼合時代需求。它是引領未來五年發展的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頂層設計，明確香港發展的目標定位、重點任務、攻堅方向與量化指標，補齊了香港長遠發展規劃的制度缺失。

二是「規劃」與「報告」實為一脈相承、互為支撐。五年規劃是一張總綱領，把控全局與方向；施政報告抓落實、抓細化，是五年規劃的年度實施方案，將宏觀戰略拆解為可執行、可督導、可檢視的年度舉措，形成「長遠藍圖引領、年度施策層層遞進落實」的完整過程。同日公布的安排，破解

了短期施政碎片化、長遠規劃空泛化的治理難題，徹底告別以往施政「短期化、零散化」的局限，讓香港發展行穩致遠、後勁十足。

「被動應對」向「主動謀劃」轉變

三是兩份重要文件同日公布是香港進一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主動對接全國戰略的關鍵一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不能只有局部，更不能只有口號而缺少行動。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制定，精準對標國家發展戰略、國家「十五五」規劃部署，立足「一國兩制」獨特優勢，銜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科創強國、金融開放、中外文化藝術交流等國家重大戰略，清晰界定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功能定位、責任擔當與發展機遇。

從治理維度審視，兩份重要文件同日公布，也可視為特區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大升級，體現了特區政府深思熟慮、謀定而後動的施政定力，也展現了結果與目標的有機結合。長遠規劃讓社會各界看清發展前景，年度施政報告細化落實舉措，推動香港治理從「被動應對」向「主動謀劃」轉變，為香港長治久安、長期繁榮穩定築牢治理根基。

「十五五」時期是國家的新發展階段，也是香港發展的新篇章，同日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是香港立足新階段、搶抓新機遇、開啟新征程的標誌性舉措，誠如李家超所言，五年規劃是「將龍的眼睛點出來」，施政報告則是「將龍畫出來」，市民若可將兩份文件共同參考，互相印證，相信對香港的美好未來將會更有信心。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會長

中歐關係為何無法更進一步？

宋魯鄭

觀世界

對大國的文明特性，國際關係界有一個高度凝練而又相當傳神的地緣政治隱喻：俄羅斯是下國際象棋，美國是打撲克牌，中國是下圍棋。生動概括了三國在戰略思維、行事風格及博弈哲學上的根本差異，揭示了它們面對世界棋局時截然不同的底層邏輯。

國際象棋是對抗與直線邏輯的零和博弈，目標就是將死對方的王。象徵俄羅斯的戰略思維極度看重地緣緩衝區和硬實力碰撞，擅長在正面衝突中精確計算兌換子力（如兵力、領土）。但缺點是戰術透明容易預判，且常陷入「必須贏」的消耗戰，缺乏變通。這在俄烏衝突上有突出的體現。

撲克牌則是施壓與心理博弈，核心不是消滅對手，而是虛張聲勢和籌碼管理。這象徵美國善於製造不確定性，通過金融霸權、軍事威懾和信息戰進行極限施壓，視外交為一場不斷加注、逼迫對方棄牌的賭局。這種風格靈活且極具攻擊性，但高度依賴對手的「恐懼心理」，一旦被識破，

如局部衝突久拖不決，籌碼（信用）就會迅速貶值。這典型的體現在持續中的美伊朗衝突上。

以布局與勢能積累為特點的圍棋則是不追求局部的勝負，而是講究「勢」與全局均衡。這象徵中國奉行長周期戰略，善於在看似無關的領域如基建、經貿落子，通過纏繞和滲透改變整體環境。通過圍地讓對方陷入「無從發揮」的困境，而不急於「將死」或「攤牌」。這種思維極具耐心，注重「雙活」共贏。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全球港口建設、以「農村包圍城市」為戰略的高科技全球布局都可稱經典代表。

所以大國博弈不僅是實力的較量，更是深層文化的比拼，是研究、擘畫大國博弈繞不開的核心。由於俄羅斯深陷衝突，已不再是當下全球主要的出牌者，現在重要的第三方是歐盟。

歐盟和美國雖然都是西方，同文、同種，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制度，還都信奉基督教，但在底層文化邏輯上，歐洲和美國差異巨大。由於歐盟國家眾多，而且德國因為歷史原因在國際事務上沒有多少發言

權，包括軍事、外交等綜合國力最強的法國可以作為代表。我們很難用一個隱喻或者一個詞來定義法國，但可以從具體的外交事件來解讀，並以美國作為對照。從中國的角度，最典型的事件就是中法、中美建交。

中法1964年建交，中美1979年建交，但美國總統尼克松1972年就訪華，法國總統蓬皮杜則是1973年。尼克松訪華時由於雙方沒有官方建交，他不能享有禮炮和紅地毯的元首待遇，機場上「打倒美國帝國主義」的標語依然醒目，而且當時考慮到美國是西方乃至整個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但他仍然願意率先到中國訪問；對比中法建交九年才有元首訪問，原因竟卡在彼此都希望對方先訪問的原則之上。而且1973年法國總統蓬皮杜訪華能夠成行，還有一個特殊推動因素：他身患絕症，餘日無多，再不就成終身遺憾。

顯然，法國重的是建交形式，美國則尋求的實質合作。

當然這和雙方國家戰略目標不同有關。法國的核心訴求是彰顯它的「獨立自主」。戴高樂不顧美國壓力，率先承認新中國，

以此表明法國要自己定義國際秩序，宣示不做美國附庸的政治姿態和原則。象徵意義層面的戰略收穫遠高於具體交易。美國則是要戰略上爭取聯合中國應對蘇聯，同時從越南解套，有具體的重大利益點。但真正的原因還是雙方在戰略思維、博弈哲學上的文明基因性差異。

從移民來到美洲起，生存長期都是第一位的，也塑造了後來美國的強烈現實主義特色，他們不在乎「外交面子」，在乎的是能否在冷戰格局中取得實質性利益，是務實的「不拘泥於名分，只求地緣實效」。阻擋法國總統訪華的原因在美國人看來是非常不可思議和迂腐的。而且「正式外交承認」是非常重要的談判籌碼，美國一定要牢牢卡住直到利益最大化。

法國則是典型的老歐洲作派：雖然已不再是霸主，但架子仍然要端着。這不僅體現在訪華上，也體現在雙方建交的博弈中。美國當時先和台灣當局中斷關係再和新中國建交，是先破後立。但法國和中國建交談判時，戴高樂卻一再提出不能損害法國的臉面和尊嚴，要向世界表明是法國主動、體面的調整外交政策。最後還是務

實、靈活的中國提出先立後破，才解決了雙方建交的障礙。

總的看來，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宏觀戰略上並不弱，但在具體操作環節卻拘泥於外在的面子、僵化的原則，甚至不惜阻礙戰略目標的實現。

今天能影響到中國復興的主要外部力量就是美歐。美國相對簡單得多，談不攏就打，或者先打，打了之後再務實談判，也不糾結誰對誰錯，面子讓位於裏子。利益只要達至妥協，就願意跟對方握手言和。但歐洲則複雜得多，可謂「既要又要還要再要」。利益雖然是博弈的核心，但卻極難妥協，即使達成妥協也未必能化敵為友。以俄烏衝突為例，當雙方打成僵局成為無底洞，美國就退出止損並和俄羅斯進行和談。但飽受衝擊和承擔主要後果的歐洲，面對既非歐盟也非北約成員的烏克蘭卻寧可獨自堅持到底，繼續支撐絲毫看不到盡頭的戰爭。俄歐也至今無法進行外交談判。

所以，歐洲這種文明特性已成為中歐關係的主要障礙。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